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 我们都是追梦人

本报记者体验新三百六十行

私人儿童摄影师

让照片不再千篇一律

本报记者 米静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都拉着行李箱，背着大包，风雨无阻地穿梭在我市各个住宅区。他们的工作就是走进客户家中，用镜头记录一个又一个孩子的成长，捕捉每个家庭的幸福瞬间。5月29日，记者来到高新区皇家贝贝儿童摄影工作室，跟随摄影师的脚步，体验私人儿童摄影师与普通摄影师有何不同。

记录孩子的原生态生活

李好霏是今天故事的主角，她有8年拍摄经验，对儿童摄影有着自己的坚持。

为什么会选择这一职业？李好霏说：“看多了身边朋友的孩子在影楼拍摄的照片，觉得孩子的照片不应该是千篇一律的背景和服装凑出来的样片。从摄影的角度看，我尊重摄影的多样化，每个人对摄影的理解不同，所以

拍出来的照片自然也应有不同，所以我决定做一名私人儿童摄影师。”

上午10时许，有顾客打来电话说，想拍摄一组婴儿生活照，李好霏挂了电话就开始与助理准备拍摄设备，记者在一旁帮忙整理拍摄工具。一切准备就绪，仅10分钟车程我们就到了约定的拍摄地点。

在顾客家的客厅待了一会儿，李好霏让记者和随行人员一起对双手进行严格消毒，并戴上口罩、穿上鞋套。经过家长同意后，记者小心翼翼地让孩子抱了过来，不料孩子突然哭了。正当记者不知所措时，李好霏马上上前，将孩子接过去安抚，并放了一段很舒缓的音乐，小宝宝马上就安静下来了。

趁着李好霏抱着小宝宝的机会，记者上前和小宝宝接触，在摸摸小手、逗了一会儿后，小宝宝和记者及工作人员熟悉起来，拍摄终于可以开始了。

拍摄地点就在顾客家里，小宝宝和妈妈、奶奶及爷爷开始像平日里一样互动，李好霏则在一旁将这最真实的一面用镜头记录下来。可能小宝宝不太适应，总是下意识扭动着身体。记者只好在小宝宝耳边轻轻说话，转移他的注意力，又在小宝宝的脸蛋上轻轻吹了一下，小宝宝感觉在玩游戏，

高兴地笑了起来，暂时忘记了拍照片的事，就在那一瞬间，李好霏抓拍到了小宝宝的微笑。

拍摄的同时，李好霏还要时刻注意小宝宝的安全，防止他不小心从床上摔下来。为了让小宝宝能更好地配合，李好霏不断调整动作，不停哄孩子，一组照片拍完，李好霏和记者的额头上冒出了汗珠。

“给孩子拍照比给大人拍照累多了，但和小朋友在一起，我也很开心。”李好霏说，她会一直坚持做好儿童摄影。

与孩子和家人沟通十分重要

“我遇到过最尴尬的事，是一次上门给一名新生儿拍摄，由于家里的老人非常传统，认为没满月的孩子不应该折腾，所以还没拍到一半，就被轰出门了。”李好霏告诉记者，由于观念问题，两代人之间就拍摄婴幼儿生活照



李好霏在拍摄中



准备拍摄用品

往往意见不一致。因此，考验私人儿童摄影师的不仅是摄影技术，更是与家长和孩子沟通的能力。

这几年，很多家长和李好霏成了朋友，她拍摄过的孩子有的已经上了小学。“在与家长的沟通过程中，尤其是新生儿家长，他们会问我很多细节问题，比如怎样抱着宝宝舒服、宝宝打嗝怎么办、为什么婴儿喜欢处在温暖之中等，我也会把我所知道的尽可能详细地告诉他们。”李好霏说。

“看这里，有一个圆形的镜头。”“看，我给你吹个又大又漂亮的泡泡。”当天下午，记者再次跟随李好霏拍摄一名刚满百天的宝宝。李好霏趴在地上，完全不顾自己的形象，冲着孩子不

停地做鬼脸、吹泡泡，嘻嘻哈哈逗孩子笑。记者也给她打下手，一会儿拿起小摇铃，一会儿拿起小布偶，为了逗孩子，个人形象已完全弃之不顾。

一天下来，记者感受最深的是，这个工作看起来简单，但是每个宝宝的情况都不一样，宝宝的配合程度、年龄、拍摄时间等都会影响拍摄质量，拍摄过程中又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宝宝展现出最好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要保证宝宝的安全，所以不仅身体累，心也很累。

“我已经很久没有穿过裙子了，因为在地上摸爬滚打逗孩子的时候不太方便，也没穿过前排带扣子的衣服，以免抱孩子的时候刮到孩子。”为了这份职业，这个爱美的姑娘放弃了很多，但李好霏说：“尽管是这样，我还是觉得与孩子在一起是件快乐的事，我享受这种感觉，看到孩子的笑脸，一切都值了。”



扫一扫看视频

见证

李航 / 主编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赢球后满场飞奔，胜利后抱头痛哭，是中国女排的经典画面。而“郎家军”最吸引人的，恰恰是不那么“标签化”的东西。朱婷的三连扣贡献了一波“王之蔑视”表情包；袁心玥赛后给记者们连唱带跳演绎神曲《小苹果》；哪怕登上奥运领奖台，大家都要一起“抖腿”表达兴奋之情……郎平的到来，让中国女排变得真实、开放，不再是挨过血泪与伤痛，而是永不放弃、我最霸气的热血。

成功伴随着郎平，忧患意识也一刻未曾离开。当初她顶住压力探索培养新人，但世界排坛的激烈竞争容不得半点松懈。望向国内，职业球员的流动、联赛的商业运作、排球的群众基础，这些都是她关心的问题，但改变岂在一朝一夕？2018年4月，郎平重新坐回中国女排主教练的位置，原因很简单——“我坐在那儿，年轻的教练和运动员心里都能踏实点儿。”有时候她也想歇歇，但只要涉及女排，就没法子停下脚步。

时间是残酷的，分秒不落地向前，无法重来。时间又很深情，如树的年轮，四季变迁都会留下痕迹。一圈又一圈后，时代和个人彼此成就，而“奇迹”之所以在郎平身上反复出现，是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永不言弃的梦想来支撑的。

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后，郎平曾收到过一份礼物：广西一个青年工人用业余时间制作了一把真正的铁榔头，像艺术品一样闪着光芒，小伙子留言说，希望我们的“铁榔头”百炼成钢。而今，57岁的“铁榔头”跳不了那么高了，皱纹也爬上眼角，但她依然昂首前行，用一场场胜利，向世界敲击出振奋人心的声响，久久回荡……

袁隆平

心里装着农民，也被农民装在心里

这条通往稻田的路，在长

沙东郊马坡岭的树木与田野间转弯抹角，我用脚步反复量过，从头到尾最多也就一公里多，但每次往这路上一走，又感觉特别漫长，这与我追踪的一个身影有关，他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大半辈子了。“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带着特有的袁隆平式幽默，却也透出一股倔强的认真劲儿。

天增岁月人增寿，2016年，他老人家八十七岁了。兴许是多年来训练有素，哪怕走在狭窄的田埂上，他的脚步也很有节奏感。当我由衷赞叹他身体好时，他一点也不谦虚，“在这样稻田里工作，一定能长命百岁！”

一条路在他的脚下延伸着，仿佛一生都在抵达之中。我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一直在琢磨，那一直支撑着他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你若问他，他便笑道：“这还真很难说，我自己都不晓得，应该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可能也和我的人格有关吧，我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要挑战自己，想能有更多的突破，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

此时，小暑已过，大暑将至，在火炉长沙，正值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三伏天，这季节最好是“伏”在家中，静静地享受阴凉与清福。眼前这位老人不是没有这个福分，却没有这样的享受，因为那田里的稻禾让他牵肠挂肚。

“我就是个种了一辈子稻子的农民”

偌大一片稻田，在一座省城已经十分鲜见了。

这是杂交水稻的试验田，又何尝不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1978年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注定是亿万中国人要铭刻在心坎上的一年，

一个依然年轻的共和国迈进了一个黄金时代，而此时已年近知天命之年的袁隆平也进入了春秋鼎盛岁月。这年早春，那被冬日的阴云长久笼罩的北京，云开日出，而那让人们期待已久的春风，也给了春寒料峭中匆匆行走的人们吹来了丝丝暖意。袁隆平也从他南方的稻田里匆匆赶来了，赶来参加他绝对不能缺席的一次划时代的盛会——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这是一个伟大时代启航的盛典，邓小平那充满了震撼力和穿透力的讲话，成为开启一个伟大时代的关键词，他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再次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就这几句话，让一向不关心政治的袁隆平猛然间有了切身的体验，他感觉那长期束缚着自己的无形的绳子终于松绑了，那长期禁锢着自己的桎梏也应声而解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闭幕式和授奖仪式，袁隆平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这也是袁隆平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级奖项。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那篇《科学的春天》充满激情、充满诗意的祝福与呼唤中，大会徐徐闭幕了，而“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后来有人评说，“全国科学大会是中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先声，由此开启了一个大国从颓败到中兴的不朽神话。”

就在这一年，袁隆平晋升为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试验田，从此，一位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就在试验田里年复一年地耕耘、播种，把杂交水稻的种子播撒到九州大地和世界五大洲。他的世界其实就在稻田里，这是他生活的全部重心，甚至是世界的中心。

(连载6)

至此，政策的落实被大大地朝前推进了一步！

不仅如此，这一年的春夏之交，万里被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代替王任重主管全国农业工作。这不仅从思想上有力地遏止了对安徽的打击和指责，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工作的思想解放，而且从组织上有力地推动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在全国的铺开和发展。

但是从内心深处，许多领导干部并没有消除疑虑。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省市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

应当说，连续两年的粮食增产，使得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优点已经凸显出来。但即使这样，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时，省市第一书记之间仍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整个座谈会上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古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等少数几个人明确表示支持“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多数与会者坚持不同意，认为这条原则只能仅限于贫困地区，其他地区则明确不准。

据杜润生回忆，会议休息当中，一位老同志拉住他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愿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由于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于是在胡耀邦和万里的共同斡旋下，由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了75号文件。75号文件指出：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应当说，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的发展上，75号文件是一份承前启后的文件，同时也是一个妥协的文件。当时不少人仍然坚持要走“社会主义的阳关道”，以致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忍无可忍地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

更耐人寻味的一段插曲

是，当时有一位老干部，为人很正直。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这位老干部和万里发生了争论。

老干部：包产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里：包产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以？

老干部：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

时值今天，以人为本，人民是天，这已经是执政者天经地义的执政理念。所有的“思想”“主义”如果不是对人民群众有益，那就绝对会被抛弃于历史的尘埃。但是在从前狂热的年代里，在“主义”和人民群众之间，许多领导干部宁要一个徒有空名的“主义”而不要群众！他们完全忽略了，社会主义如果值得拥护，那它必须具备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即对人民群众有益！

万里当时表现得非常敏捷，也非常出色。

万里说：我要群众！“我要群众！”这是多么凛然的呼声！

遗憾在于，当时这样的呼声，甚至这样的思维都太少太少了！

那时候，想“主义”的人太多太多，想“群众”的人太少太少！

注定将载入史册

不管争论得多么激烈，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确实是在一步一步地前进着。

在经过激烈争论之后，会议最终形成了75号文件。文件充分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实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对包产到户的性质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它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从此，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的推行，由半明半暗的、自发的状态转入公开。截至1980年10月，全国实行各种联产承包的村落已占到原生产队总数的83.3%，其中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占50.85%；到1981年底，全国



莫伸 / 著

农村有90%以上的生产队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至此，党中央已经从思想上、组织上、舆论上为整个中国农村即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包产到户。而随着包产到户后农村出现的新面貌，又有越来越多的人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

李百灵为我讲述了一件他采访中听到的事情：在一次研究农业问题的会议上，后来被公认为农村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杜润生有一个讲话，他说：分田到户、包产到户是我们对农民的一个应有的让步。谁知与会的甘肃代表在讨论时坚决不同意他的说法，他们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对农民的让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大多数的同志都认同甘肃代表们的意见，认为批评得好，批评得对。

杜润生本人也同样接受，他诚恳地表示：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那样讲了。

值得一说的是，随着新的农业政策的铺开，到1980年末，中国农村的粮食收获情况是——

仍然坚守在人民公社阵营里边的平均产量不增不减。包产到组的村社平均增产10%到20%。

(连载25)

作品连载